

战争背景下的儿童游戏 ——再论《小兵张嘎》的电视剧改编

柳应明

(盐城工学院 人文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小兵张嘎》为了能吸引和打动当下的孩子们,对人物进行了增改,情节进行了添补。这一改编的可取之处是:凸显了儿童主角、张扬了游戏精神、注重人性伦理。但它仍存在一些缺憾:为突出个性而忽视了儿童的本性,为增强趣味而冲淡了原有的品味。

关键词:《小兵张嘎》;改编;儿童主角;游戏精神;人性;缺憾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0)03-0042-05

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小兵张嘎》问世后,曾引发过一个小小的收视热潮,并受到不少人的推崇:有人称其为“改编‘红色经典’的新维度和新尝试”^[1],有人认为它的改编“忠于原著,再添新意”^[2]。当然也有人指出了它在叙事上的诸多不足^[3]。至今五年过去了,我们可以更平静、公允地来谈《小兵张嘎》的改编了。

小说原著《小兵张嘎》创作于上个世纪50年代,1963年改编成电影,由于其题材的新颖(儿童参加战争)与人物形象的生动饱满而受到了一致的肯定,这部电影也因此而在新中国几代人的童年记忆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那么40多年后这一次的电视剧改编又如何呢?

改编就是再创造,而由于时代背景、受众语境以及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差异,这种改编往往吃力不讨好。而从题材上讲,《小兵张嘎》又颇为特殊:战争(革命历史)兼儿童题材。面对如此特殊的题材,如何在经济日益发达,各种传媒资讯充斥的现今社会,给那些外部生活环境与内在心理世界都异常丰富与复杂的孩子们,重新讲述那个“张嘎子”的故事,不能不说是电视剧改编者们所面临的挑战。《小兵张嘎》(以下简称《嘎》)的改编者们,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大胆突破了小说原来的格局,把战争题材的故事演绎成了一场儿童打

鬼子的游戏。改编后的《嘎》避免了国家广电总局两个《通知》中所批评的那些缺点,但仍存在一些缺憾,主要表现在:为突出个性而忽视了儿童的本性,为增强趣味而冲淡了原有的品味。

一、儿童主角的凸显

“冲突”原本是戏剧中的核心概念,对于电视剧也同样适用。而战争题材的电视剧当然应以敌我矛盾的冲突为主线。可《嘎》中的敌我矛盾只是表层的,剧中还有孩子与成长这一潜在的冲突线索。而无论是表层的矛盾,还是潜在的冲突,其焦点都是张嘎子。

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最大的区别在于:儿童文学是面向儿童的文学,其接受主体是儿童,因而其创作的中心也应该围绕儿童。这样的道理,我们现在看来很简单,但是在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的几十年历史中,儿童主角却因为种种原因而被遮蔽了。

在十七年的儿童文学中,“小兵张嘎”这一机灵生动的形象给当时色调单一的文坛增添了一抹亮色,但是仔细阅读小说文本,我们却不无失望地发现,嘎子仍是作为战斗英雄的陪衬或成人角色的附属而出现的。作者在描绘嘎子时,总是要对钱队长赞美几句:“其实,区队长对他是很亲切

收稿日期:2010-04-14

作者简介:柳应明(1969-),男,江苏东台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的,看顾他的吃穿休息,给他讲革命的道理,甚至抽工夫教他认一个两个生字,那份细心,不下一个很有耐心的女教师。他是在精心地培育着这个孩子,要把他造就成一个真正的人民战士啊!”在小说的情节铺设上,作者也时时不忘突出钱队长机智与英勇,而嘎子只是作为一个“被范导者”的形象穿插于其中,真正引领剧情发展的仍是成人形象——钱队长。这样的情节安排自然与作家的创作背景是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后,新的社会形态所形成的集中的体制必然要求文学观点与规范的统一,这不可避免的给当时作家创作带来直接的影响。十七年中,整个文学界为响应各种运动而“疲于奔命”时,自然会造成“人与自我的失落”(丁帆语),急于通过自觉的思想改造,向党表明“忠诚”,致力于塑造新中国英雄群像的知识分子们无暇也无力去关注其笔下人物的个性。徐光耀的有关创作谈中也曾谈过写《小兵张嘎》时,他正处于被定为“反右”的苦闷与惶恐时期。作家们的心态决定了他们所需做的和只能做的就是从各个行业、各个年龄、各个角度去印证这个群像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本身就依附于成人文学的儿童文学创作,对儿童主体的忽略就显得不足为奇了。

而电视剧《嘎》中,不光所有的矛盾冲突都是围绕嘎子展开的,让嘎子最先得知混入区队的特派员是假的,而联合胖墩、英子、佟乐等为帮助真特派员与鬼子展开斗争。而且,还让嘎子来做剧中各个人物的串连者,由嘎子使得胖墩、英子、佟乐走到了一起;由嘎子引出了胡半疯、佟掌柜、纯刚、歪嘴等一系列人物的活动,呈现出“成人搭戏台,孩子唱大戏”的态势。当然真正标志着主角凸显的还是嘎子身份的变换。

在十七年以及“文革”时期的儿童文学中,孩子总是作为成人的依附品而出现的,孩子被定性为不成熟的、幼稚的,需要成人的教育与塑造。于是,通常在那个阶段的儿童文学中会出现“队长”、“指导员”之类的形象,他们往往自身就是战斗英雄,具有权威性,如小说《小兵张嘎》中的“钱区队长”,《我和小荣》中的“赵科长”,《长长的流水》中的“大姐”等。他们在照顾孩子生活的同时,更肩负着对孩子的政治教育的重任。他们常以“精神之父”为名,以范导者的身份,通过重复

与推导革命道理的形式来强化孩子的革命意识。因而,这类小说通常会出现孩子被教育后,眼里有了泪花,明白了自己的错误,明白了必须先“国仇”,再“家恨”,明白了要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并且,孩子在被范导的过程中,不会出现任何的抵触与疑问。

电视剧《嘎》则有所不同。

首先,出现了“嘎子”自己的部队,嘎子成了领导者。嘎子不再听命于钱队长的教导,不再是见到钱队长觉得“很有点发‘拘’”,总觉得他还有什么更拿人的地方”了。剧中多次写到他与钱队长的冲突。他不像小说中挨训后光会哭,而是会顶嘴,会出走,甚至独立山头,自己拉出一支队伍,与成人队伍比赛打鬼子。尽管这支队伍的成员都是和他一般大的孩子,但是他们敢于捉弄联络员纯刚,敢于肆无忌惮地出入鬼子司令部,敢于做成人所不敢做的事情。

其次,嘎子由普通小兵成为“领袖”。电视剧中的嘎子由“被范导者”变为了“范导者”,他用孩子独有的办法说服胖墩干八路,因为佟乐不再认斋藤为“干爹”,而吸纳他到队伍中来。不仅如此,他还成功地争取了许多中间人物。比如:胖墩的父亲胡半疯,这个原来满脑子守旧思想,管它外面世界天昏地暗,只要能守着皮影和儿子太平过日子就心满意足的旧艺人,由最初的抵制革命到被嘎子的勇敢而激励,最终烧了皮影,大闹鬼子司令部。乐乐的父亲佟掌柜,本来一心想着只要老婆儿子平平安安,鬼子、八路左右逢源,集贤居酒楼生意能做下去,一家人好好生活,却因为嘎子的一再“搅和”和家庭遭遇的变故,由被妻子所看不起的懦弱男人,逐渐转变成有革命理想,并且参加革命,成为区队新的联络员。而最能突现嘎子范导者身份的是对伪军“冯歪嘴”的改造。冯歪嘴本是一个毫无民族观念,只求在日本人手下混点事做,拿点大洋,娶个媳妇的普通市井混混。他本是斋藤安插与假特派员石磊联系的接头人,但是他带回来的真情报,因为嘎子的假情报的掺合,并被嘎子指认为“八路”,而遭到斋藤的怀疑。此时,他恨不得杀了嘎子,但是嘎子却抓住了他心底的最后防线,反复向他灌输“中国人不当汉奸”的观念,而“蛊惑”他越狱。最终,他与嘎子配合挟持了斋藤。

由此,“嘎子”已经被被“精神之父”引领的懵懂少年转而成为教育别人的先进者,这也是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新特点,儿童不再满足于对成人法则与教导的机械接受,开始有了自己强烈的参与意识与独特的个性思想,并由乖娃变为硬汉。

二、游戏精神的张扬

游戏精神是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精神之一,这是众多儿童文学作家与理论家反复强调的。但这种游戏精神在当代几十年的儿童文学发展中并未能够发扬光大,一直到新时期才有了改观。在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界,“游戏精神”已基本被认同为:快乐原则、幻想原则和自由原则。

《嘎》剧的改编无疑是秉承了这样一种美学观念。

从情节设计上,整个战争故事就像一场游戏。游戏的内容是:辨识真假特派员,搞清药品的转移时间。游戏的参赛人员则是:八路与鬼子,孩子与成人。而游戏的最终结果自然是孩子在成人的协助下,打败了鬼子,取得了胜利。

而在具体的细节上,无处不透着游戏的原则与快乐的氛围。例如,在鬼子司令部和龟田比赛打弹弓、爬树、憋气等。在孩子阵营里,经常会出现相互斗嘴的情形。甚至他们躲在马车上快要进城遭遇鬼子盘查时,佟乐和胖墩两人还差点打起来,而打架的原因仅仅是出于胖墩不守信用又骂佟乐是“小汉奸”。这些微小的细节充分体现出孩子所固有的天真与童趣,而这些童趣是永恒的,不是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所能掩盖的。第八回中,胖墩和嘎子智斗冯歪嘴时,明显采用了深受当下孩子喜爱的《小鬼当家》的一套把戏。比如引歪嘴进屋,在门上放了水桶,歪嘴一推门,淋了一身,之后又拿石灰粉砸,用门口的棍子绊,等等。这就使得不管是作为剧中的孩子,还是作为受众的孩子都充分感受到游戏所带来的快乐,从而在笑声中拉近了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与当下孩子的心理距离,弥合了时代的断裂。

该剧最大的喜剧色彩则是由“冯歪嘴”这个人物所增添的。在原著中,冯歪嘴的原型应该是一个名叫“红眼儿”的伪军,电视剧将其重新塑造为一个插科打诨的丑角。在外型塑造上仍沿袭了十七年反面人物塑造的手法,使其一出场就是歪

嘴,但是又特别忌讳别人叫他“歪嘴”。通过他与搭档“高杆”,与“胖翻译官”,后来与斋藤、石磊等人的一系列言语与行动的冲突,以及后来的娶亲等,为这部剧作增添了许多笑料。这些设计成功吸引了当下的孩子,同时也说明了“幽默”是儿童文学与孩子沟通最简单最直接的途径。

突出游戏精神,为的是增强趣味,吸引儿童,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当今影像时代的一种市场运作策略。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影视剧改编,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剧烈的市场竞争。投资方所追求的是收视率和娱乐性,考虑市场回报。这当然往往会把“改编降格为利润的奴隶,被‘资本的力量’牵着鼻子走”^[4]。与其他“红色经典”的改编不同,《嘎》无法在主人公身上编织过多情感纠葛,更无法强化爱情戏,在追求人性的复杂化方面空间也有限,因而游戏与趣味便成为求胜的最佳选择。于是在改编中加入了当下比较流行的漫画元素、传奇色彩,以感染在卡通世界里长大的新生代“蛋白质儿童”。嘎子的机智大胆、独立特行、嘎气十足等便都成了吸引孩子的最好元素。

三、人性意识的回归

回归人性伦理是整个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大趋势,对于儿童文学来讲,不光要承认儿童为人的人性,更主要的是儿童之为儿童的特殊的生理和心理需求。

对于革命历史题材儿童文学来讲,过去的政治口号对于现今的孩子已经完全是一堆苍白无力的文字符号,他们无法体会出其中崇高的阶级感情与深刻的民族仇恨。因而淡化政治意识,由政治阶级层面转为道德人伦层面,用永恒的人性与时俱的孩子沟通,不失为该题材儿童文学与时俱进的有力手段。这在《嘎》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人物关系的安排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突破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电视剧《嘎》在人物安排上与原著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再是“截然分明的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而是明显多了一个阵营,即中间人物阵营,如佟掌柜、仙花、胡半疯等。他们并无强烈的民族情感和阶级意识,他们只求每天生活安定,有饭吃,有戏唱,日子太平。中间人物阵营的突出打破

了过去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的创作思维模式,冲淡了旧模式中的政治意识,更增添了生活气息,缩小了与当今社会生活的差距。

在传统的两极阵营里,电视剧也增添了许多人物,平衡了双方的力量对比,增加了历史的可信度。敌方阵营中由新添的斋藤、石磊这两个日高课的高材生唱主角。他们不同于龟田这类老派反面人物,他们不仅举止儒雅,具有高智商,并且深谙中国文化和民族心理。而我方则由罗金保和纯刚挑大梁,钱队长明显“退居二线”。这样的安排,是为了增强故事的可视性和趣味性,但更主要的是对政治意识的弱化。因为,无论是斋藤还是罗金保都不再完全是阶级和民族的代表,他们身上缺少老派人物所具有的浓烈政治蕴涵。

对于唯一的女八路刘燕的塑造更体现出对人性的肯定。在传统的该题材作品中,无论英雄还是普通革命者是不分性别的,比如《红岩》中的江姐,唯一标示着其女性身份的大概只是她的梳子与红色外衣。而《嘎》中的女八路刘燕日夜思念自己襁褓中的孩子,流露出女性的柔弱胆小、母性的牵挂心疼等等特点。当她把中央密件交给嘎子后,竟只身一人闯鬼子司令部去救自己的孩子,在革命战士的身份上又恢复了一个女性、一个母亲的身份。

其次,在主题的表现上,《嘎》并未像小说与电影那样强调“国仇”,而是把重心落在了“家恨”上,由政治伦理层面回归到道德伦理层面。

在小说和电影(电影尤甚)中,嘎子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立场,高度的觉悟,是非分明,战斗坚决;自觉地为人民战争服务,主动放哨、联络、侦察。当亲人被害后,更是怀着深仇大恨找到了“组织”,最后在“组织”的帮助下报仇雪恨。电视剧《嘎》却从亲情入手激发孩子的仇恨意识,设计了嘎子亲眼看到奶奶被杀害,胖墩的父亲被日本人烧死;雁翎队烈士的遗孤英子的爷爷奶奶又被鬼子残忍杀害;佟乐妈妈被龟田强暴等等情节。只有看到亲人被杀害,拨动亲情这根弦,才能引起当代孩子在情感上的震动。当然,《嘎》也曾试图像小说与电影那样由亲情伦理上升到国家民族仇恨上,但这样的努力被胖墩的一句“八路就没有爸爸了吗?”而消解淡化了。

最后,在叙事视角上,《嘎》剧放弃了成人的政治评判目光,而采用了儿童视角。比如,让“根红苗正”的小英雄嘎子和佟乐这个生在小资产阶级家庭、又做了日本特务斋藤的干儿子这样如此复杂的孩子成为好朋友。这一情节在十七年儿童文学中,在成人的政治目光中,是绝不可能、也不允许出现的。那时的作品中有的只是好孩子、苦孩子与地主崽子打架。但从儿童视角来看,只要是孩子都有可能成为朋友。而当刘燕把药品过境的秘密文件交给嘎子,让他交回区队,自己去城里救孩子时,嘎子并没有先回区队,而是按照一个孩子天真的想法来判断事情的轻重,在孩子们看来,帮助一路保护他们的刘燕姐姐救回孩子,要比回区队送信更为重要。

四、存在的缺憾

尽管《嘎》剧的改编取得了较大成功,但当它过分突出儿童主角、张扬游戏精神时,缺憾也随之而来。这就是:为突出个性而忽视了儿童的本性,为增强趣味而冲淡了原有的品味。

过于突出儿童主角,强调孩子当家作主,过分迎合当下孩子的阅读需求,一方面使得剧本本该具有的“历史真实性”消失。历史是既成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无论嘎子怎样机智勇敢,他也不可能成为战争中的主角,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孩子受制于成人,受制于政治的历史事实。而《嘎》在不少情节设计上恰恰忽略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为突出个性而忽视了儿童的本性。小说和电影中的嘎子机灵可爱,虽然有时倔强任性,但始终不失孩子淳朴天真的本性。而电视剧中的嘎子则多了些痞气、霸气、江湖气。如他第一次到集贤居吃饭就不给钱,还拿罗金保吓唬佟掌柜,丝毫没有乡下孩子进城的那种胆小畏怯感。再如对纯刚身份的武断猜测、多次不听指挥,等等。这些情节的设计,也许编剧是为了增添嘎子的“嘎”气,加强趣味性,但这种“嘎”却过了头,削弱了张嘎的英雄豪气,使其成为一个是非不分、擅自作主、呈个人英雄、把战争当游戏的浑小子。

游戏精神包含快乐、自由与幻想等,但一味地追求热闹,容易滑入纯粹的快乐主义,纯粹的感官官能的愉悦与低级的搞笑幽默,由喜剧降为闹剧。《嘎》剧的故事背景仍是日本侵略中华大地之时,

可关于战争中的残酷、血腥、悲痛,我们却不是从儿童身上看到的,而是从纯朴的老大娘、老大爷的被害上看到的,从孩子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趣味盎然的“游戏”。儿童观众会为嘎子的机智而笑,为敌人的愚蠢而笑,可这种笑中是不可能悲的,

有时这种笑还会喧宾夺主。成人当然明白这不过是编演的电视剧,可孩子们却会把它当成真实的历史,而且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原来战争是这样有趣!这多少背离了创作者的初衷。

参考文献:

- [1] 彭文祥. 电视剧改编“红色经典”的新维度和新尝试——电视剧《小兵张嘎》的叙事特色[J]. 中国电视, 2004(11): 23 - 26.
- [2] 乔霞. 忠于原著 再添新意——谈电视剧《小兵张嘎》的成功改编[J]. 当代电视, 2004(11): 36 - 37.
- [3] 张希. 电视剧《小兵张嘎》的叙事策略[J]. 中国电视, 2004(11): 27 - 29.
- [4] 陆绍阳, 张岚. “红色经典”改编的背后[J]. 中国电视, 2004(9): 58 - 60.

Children's Gam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War ——On the TV adaptation of “The Young Solider Zhang Ga” Once Again

LIU Ying-m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Yancheng 22405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attract present children's attention and make them moved, the revised TV version of “The Young Solider Zhang Ga” has not only added and changed its original figures, but also changed its original plots. The advantages of this adaptation exist in highlighting child as the main character, publicizing the spirit of games and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humanity and morals while its shortcomings exist in neglecting the nature of children and trivializing the taste of the original one.

Keywords: the young solider Zhang Ga; adaptation; child protagonist; the spirit of the game; humanity; deficiency

(责任编辑:李开玲;校对:李 军)